

# 二陸入洛與南北文化交流

簡漢乾

## 提 要

陸機、陸雲是西晉時期的重要作家。陸氏家族在東吳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東吳亡國後，二陸由南入北，南北文化的差異與碰撞，均在兩位作家的經歷與作品之中有所反映。本文聯繫西晉學術文化的背景，通過分析二陸入洛的心態和作品內涵，揭示其對南北文化交流的意義。

**關鍵詞：**陸機 陸雲 南人入北 文人心態 南北交流

關於陸機和陸雲的研究，目前多見於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和詩歌史的論介，一般側重在陸機的詩歌風格和《文賦》理論，少有對其思想和創作背景的深入剖析。本文擬另闢視角，從由南入北的心態來考察二陸作品的思想內涵，認為其中體現的南北學術文化的差異和碰撞，對於觀察魏晉南北朝早期的南北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 一、西晉統一後的南北文化差異

公元 280 年，司馬炎消滅孫吳，統一中國。南方士人自視甚高，但在北方士人看來，總是亡國之降人，因而形成統一初期南

北士人互相排斥的情況，如早期入洛的南士華譚，便受到北人王濟的歧視<sup>[1]</sup>。南北士人不和，不利於統一帝國的管治，有見於此，西晉朝廷對南士總體上是採取籠絡的政策，招攬他們入朝廷當官。如晉武帝司馬炎看到吳地新附，但吳人卻“難安易動”，於是便向華譚請教“綏靜新附”之道。華譚認為晉室應使用各項懷柔政策禮待孫吳士人，加以擢用；並慎選刺史，減輕賦斂，與民休息<sup>[2]</sup>。

然而，《晉書》中也有關於吳人人洛後不受重用的記載，如陸機曾上書推薦賀循、郭訥，當中提及吳士不被朝廷所用的情況：“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sup>[3]</sup>關於“揚州無郎”之說，周一良先生已舉《晉書》諸例以證其不準確：

《晉書》卷六八《賀循傳》，“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案：卷九二《褚陶傳》載，陶吳郡錢塘人，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云云。卷五四《陸機傳》言機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卷六八《顧榮傳》言吳人入洛例拜為郎中，榮後為尚書郎。陸機有贈尚書郎顧彥先詩。是揚州未始無郎也。郎之為官，在西晉朝廷實為清選。……大抵西晉平吳以後，對吳蜀舊地固多防範，然司馬氏對江南地主階級亦頗致籠絡。<sup>[4]</sup>

從上可知，晉朝對待吳地士人，大體上是有一套既定的錄用規矩，這有助吸引吳士入北，為新朝效力，緩和南北關係。但陸機上書也說明在南士看來，朝廷用人仍不能南北平衡。

孫吳雖兼有江左一帶，經濟上有其富足之處，但若以幅員、國力而論，始終難與北方相抗。如《三國志》裴松之注云：“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sup>[5]</sup>又譙周遊說蜀漢後主劉禪投降，分析天下大勢，認為當時北統一南，難以避免，“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

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sup>[6]</sup>。然而，在吳人心中，憑恃與北人相抗者，不在國力的大小、幅員的廣狹，而在文化的傳承。這文化的傳承是指體現國家內在精神的學術文化，尤其標榜以繼承東漢醇儒正統的思想自居。在史乘中，我們不難找到吳人視自己為正統所在的言論，如步騭上疏云：“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攬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sup>[7]</sup>步騭視孫吳為王化正統，北方的勢力則為僭逆。與北方相較，吳國在政治、經濟上雖處於弱勢，但其文化發展匪淺。如修禮樂是國家文化盛事，除了在中原立國的魏、晉曾改漢曲詞，以述國家功業外，吳國也有相似的活動，但蜀國則沒有相關記載。吳國於孫堅、孫權兩朝“使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sup>[8]</sup>。禮樂制度能體現一地的文化盛衰，吳國能在戰亂之際仍不忘制禮樂以宣揚統治者的功業教化，可見對文化的重視。有趣的是，何以他們以偏處一隅的弱勢，卻有這樣的自豪感？又，後來吳國滅亡，入洛吳士如陸機等在面對北人的揶揄時，卻從沒有自卑退讓。筆者認為，這些看起來似是意氣之爭的言論，背後反映的是南北文化的碰撞、較量<sup>[9]</sup>。南北士人由互相輕視而至欣賞，這種文化共融的歷程，可由二陸兄弟身上體現。

在漢末至西晉初期，南北文化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按文化傳統之中，具有指導國家體制運作的儒學思想可以為代表。吳國偏處江左一帶，在學術上仍承襲東漢醇儒的傳統，借天道象數論人事，較少摻雜老莊成分，此其一；其次為儒學之士評論朝廷人物銓叙的清議，吳國仍保有東漢固有士風傳統，清議尚未發展為清談。

湯用彤先生《魏晉玄學論稿》點明了玄學發展的歷程，當中透露了造成南北隔閡的重要元素——文化學術的差異。湯先生云：“漢代偏重天地運行之物理，魏晉貴談有無之玄致。二者雖均嘗托始於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數理之消息盈虛，言天道，合人事；後者建言大道之玄遠無朕，而不執著於實物，凡陰陽

五行以及象數之談，遂均廢置不用，因乃進於純玄學之討論。漢代思想與魏晉清言之別，要在斯矣。”<sup>[10]</sup>漢代的舊學藉言天道反映現實政治，新學則變為純粹於哲學上的討論：“漢代舊《易》偏於象數，率以陰陽為家。魏晉新《易》漸趨純理，遂常以《老》、《莊》解《易》。新舊《易》學，思不相參，遂常有爭論。”<sup>[11]</sup>新舊學的思想家各自為政，互不相容。其實，新舊學本無高下之別，都是根據先秦學術按當時實際需要作出闡發，使之能滿足時代的需求，兩者均只是學術發展的先後變化而已<sup>[12]</sup>。南方一帶保持東漢的傳統，較守舊，北方則趨新，這個現象是經歷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方形成的，中間的關係也頗為複雜。湯用彤先生在研究魏晉思想發展軌迹時，把這情況作了精要的歸納，可為的論：

魏晉時代思想界頗為複雜，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確切的“路數”，但是，我們大體上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有兩個方向，或兩種趨勢，即一方面是守舊的，另一方面是趨新的。前者以漢代主要學說的中心思想為根據，後者便是魏晉新學。我們以下不妨簡稱“舊學”與“新學”的兩派。“新學”就是通常所謂玄學。當時“舊學”的人們或自稱“儒道”……其實思想皆是本於陰陽五行的“間架”，宇宙論多半是承襲漢代人的舊說；“新學”則用老莊“虛無之論”作基礎，關於宇宙人生各方面另有根本上新的見解。<sup>[13]</sup>

魏與西晉在北方立國，鼓勵新學，再加上魏晉時期朝政黑暗，士人多對實際政事避而不談，轉為玄理清談；而支持漢末舊學的儒士因著中原的戰亂，南遷江左避難，故造成南北學風的不同。正史記載北方這批儒生避亂南遷，致使江左一帶能保有東漢醇儒之風。如陳壽稱之為“一時儒林”（《三國志·吳書》）的嚴畯<sup>[14]</sup>、程秉<sup>[15]</sup>，便因避亂投效孫權。北方儒士避亂南方，豐富了南方的儒學傳統；除此以外，在南方也有一批熟習儒家經籍的文士<sup>[16]</sup>，如士燮、闕澤、薛綜、虞翻及陸績等，均對儒學有一定的

造詣。晉國滅吳前夕，北方的文化、士風情況，於傅玄的奏疏中可見一斑。傅玄曾上書晉武帝，痛砭當時士風頹弊、好尚虛浮，把東漢以來儒生借天道論人事以批評朝政的清議，漸變為只重玄理的空談。我們從中可得到地區文化差別的消息：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禦，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sup>[17]</sup>

姜亮夫評此條資料云：

按，此疏論魏、晉士習至切……然此風於中原為烈，南土如吳，則士風並未大改，仍保東漢醇厚儒素之習，熟讀陳壽書自知之。<sup>[18]</sup>

中原經曹操的統治，盛行用人唯才、不問出身、以法術刑名治天下的風氣，相反南方的孫吳政權，吸收南來重舊學的儒生，並與吳會望族融合，仍保留固有儒風。

吳國士人對南方文化的看法，較難在陳壽編修的官修史書《三國志》中找到資料。文化涉及正統的核心，在繼承曹魏以正統自居的西晉統治者心中，當然不會承認孫吳的文化地位。綜觀《三國志》、《晉書》，史家對吳國常以“荆蠻”看待，如《晉書·樂志下》：“蠢爾吳蠻，武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橫被，廓東隅。”除此以外，正史中提及吳人，多有“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晉書·石苞傳》）的評語。在政

治上,中原所在的北方向被視為正統所在,觀乎《三國志》“以魏為正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陳壽身為晉臣,撰史時自有政治上的考慮,就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西晉後來滅蜀吞吳,以政治影響而言,自然視北方為正朔所在。

然而,南方既保有漢末的士風儒行,孫吳所轄舊地,保守勢力尤盛,對自己固有的傳統自視甚高,在文化上難以全盤接受北方。在現存吳人創作的詩文之中,這方面的資料不難撿拾,如下節將提及的二陸兄弟,其作品中流露出對故國的自信,便體現了孫吳士人的正統文化心態。吳人肯定故國文化傳統的心態,歷久不變,葛洪可作為集中體現這種心態的例子。唐長孺先生由《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之不同,曾說:“葛洪是吳人,當吳國滅亡與晉室東遷之後,親見江南士人慕效洛陽風氣,他是個比較保守的人,對於舊俗的廢棄很不滿意,所以加以譏刺。”<sup>[19]</sup>葛洪祖父輩本為吳臣,吳亡入晉,仕於異朝。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多有對北方文化不滿的言論,他身處東晉偏安江左的時候,距離吳國滅亡的時間已達三四十年,但仍對南遷的北人諸多不滿。可見吳亡以後,江左一帶士人始終未能完全與北人融合,地區的文化差別未能於短時間內消除<sup>[20]</sup>。與葛洪同樣來自吳國的二陸,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用文學作品表達了他們處身北方的內心矛盾以及對南方文化傳統的堅守。

## 二、二陸入北的內心矛盾和掙扎

陸機、陸雲是西晉太康時期的重要詩人,也是入洛吳人中活躍而重要的人物,他們的行事、思想當有代表性,有關他們的歷史記載與傳世詩文,或可幫助我們了解入洛士人的精神面貌。文學史上歷來對二陸作品的思想性評價不高,多批評陸機詩缺乏真情實感,如果從南人入北的心態來看,二陸的作品其實是真

實地反映了他們內心的矛盾和掙扎的。

孫吳政權滅亡後，陸機兄弟隱居十年，閉門讀書，這個時期可算是他們心理上的適應時期。陸機反思吳國滅亡之因，寫下了著名的《辯亡論》，認為吳國早期的君主禮賢下士，各方英傑薈萃吳會一帶，人才濟濟，吳國經濟實力雄厚，土地肥沃，又有天險可守，實在有極強的優勢，可惜孫皓未能維持國勢於不墜，因此“深慨孫皓舉而棄之”<sup>[21]</sup>。陸機退居舊里十年，終於在太康末年與弟雲入洛，這行為是充滿矛盾的。二陸入洛，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司馬氏政權主動徵召，難以推辭<sup>[22]</sup>。兩人名重當時，又正值晉武帝採納華譚用南士之議，故成為晉朝徵召的對象。陸機於元康二年(292)再次赴洛之際，寫有《赴洛二首》<sup>[23]</sup>，其一云：“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呂延濟注云：“有命，君命也。”<sup>[24]</sup>日人佐藤利行推斷：“以第三、四句‘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言之，在入洛時，或許是受命於晉朝也未可知。”<sup>[25]</sup>因此，若推論陸機入洛實為不得已，應該是有根據的<sup>[26]</sup>。

陸機、陸雲既有濃厚的故國之思，曾因吳亡而隱居十年，那麼為何仍願意出仕於晉室？除了王命難違以外，陸氏家族重視功名也是重要原因。觀乎陸機《遨遊出西城》一詩，強調“靡靡年時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圖，使爾修名立”，可見其出仕之心頗切。又如《演連珠》三十一云：“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sup>[27]</sup>歷來研究者也正因為這一點而對陸機多所譏評，故而對其作品的思想內涵不願深究。

但若從二陸對孫吳故土的看法去歸納、梳理出兩人心中對南北文化的取向，可以彌補歷來研究的空白。西晉滅吳，雖然政治上已由北統南，但基於客觀環境、個人遭遇的影響，二陸於感情上始終視吳國為正統所在，這對於考察西晉的南北文化碰撞頗有價值。這種感情具體表現在以下四方面：對吳國的懷戀，對先祖功業的贊頌，對孫吳政權的評價及對吳地文化傳統的堅

守。這四方面都可以歸結為一種文化上的異俗之感，即儒家所謂的風俗，實包含了政治、民情、教化、風土等多方面的內涵。

### (一) 對吳國的懷戀

陸機入洛後，其詩文常流露出故國之思。晉武帝太康十年(289)，陸機在啓程前往洛陽的時候，寫下了《又赴洛道中》詩，其一抒發自己與親友難捨難離的憂愁，“世網嬰我身”一句，正道出了自己因不能擺脫世俗羅網的羈絆而決定去吳入洛的真正原因。詩中描寫了沿途荒寂的景象，最後發出了“佇立望故鄉，顧影淒自憐”的歎唱<sup>[28]</sup>。

入洛之後，陸機對已滅亡的故國，更感思念，這在他的詩文中形成一種主調。《懷土賦》是入洛以後之作，序文說：“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sup>[29]</sup>離家日久，思鄉越深，即使故鄉的一草一木，縱然微不足道，也足叫人依戀不捨。

對故鄉的懷戀，是陸機詩文的重要內容<sup>[30]</sup>。陸機懷戀故土的作品，都寫於他仕晉期間，如寫於入洛不久的思鄉之作樂府《悲哉行》：“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沉。願托歸風響，寄言遺所欽。”便寫出了遊士對故鄉的思念<sup>[31]</sup>。又如陸機入洛赴太子洗馬時的《赴洛二首》其一中有這樣的詩句：“臺臺孤獸駢，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愴我歎，寤寐涕盈衿。”與作於東宮的《赴洛二首》其二“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淒惻……憂苦欲何為，纏綿胸與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均表達了思念故鄉的深切憂愁。再如寫於晉惠帝元康初年的《贈從兄車騎》，也流露了客遊寄迹的心態：“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心。”<sup>[32]</sup>到了陸機入洛十一年後，即40歲時（距離他遇害3年前）的詩作，仍流露對吳亡的惋惜，如《歎逝賦》其中有這幾句：“悼堂構之隕瘁，潛城闕之丘荒。……托末

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sup>[33]</sup>可見陸機視身處洛陽爲客身寄存，他雖身仕貳朝，但故國之思始終不減。陸機在 29 歲入洛至生命終結之時，時刻不忘故鄉，他於軍中遇害，猶歎“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晉書·陸機傳》），在他的作品中，懷鄉成爲主調。陸機懷念故土的詩歌雖無流露他的文化取向，但若歸納分析，當可發現其表現的不是一般的離鄉遊宦的心情，而是一個亡國之臣不得已出仕新朝的哀鳴。在陸機看來，吳國始終永存心中，他赴洛出仕，是在爲吳國守喪十年之後，只能面對現實，走上人生必須追求功名的道路。因此，吳國對於他來說，就像魏國對於曹魏士人一樣，是名正言順的舊朝，而不是僻處東隅的藩國。他對南北文化的取向正根源於他對吳國政治正統的認同感。

至於其弟陸雲，由於現存作品較少，較難看到整體面貌，但懷歸思鄉的心情，在其有限的作品中也不難撿拾。如《愁霖賦》云：

愁情沉疾，明發哀吟，永言有懷，感物傷心。結南枝之舊思兮，詠莊舄之遺音。羨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湲而沾襟。<sup>[34]</sup>

此賦作於晉惠帝永寧二年六月，序中詳述作賦之由，是由於鄴都久雨成霖，生民愁瘁，故與友人作賦寄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因“同僚見命”而寫的賦作中，前半部分寫鄴都“雨淫淫而未散”的災情，後半部分卻流露了作者對故鄉的懷念。賦作寫目前之景而寄故鄉之情，倍覺細膩。如南枝舊思、莊舄越吟已流露作者對故土之思，再加上“羨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引用《詩經·小雅·小弁》“弁彼鸞斯，歸飛提提”的典故，對鸞斯能拊翼歸飛的欽羨之情，躍然紙上，自然使人想起《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的感歎。可見詩人對故鄉江南之思極深。

陸雲入洛，內心始終存有隔膜，如他贈答入洛同鄉友人張俊的詩《答張士然》，當中便有以下幾句：“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

塵。通波激江渚，悲風薄丘榛。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sup>[35]</sup>在陸雲心中，北方始終是異俗他鄉，誠如《文選》呂向注云：“百城，郡也。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鄰，謂吳漢之異。”由此而帶出風土不適的苦惱，以及對桑梓的思念，可見陸雲和其兄一樣，對南方的思念不僅是故土之思，更是南北風俗差異的問題<sup>[36]</sup>。

二陸雖廁身於晉朝，卻又心繫故國，造成他們未能接受客觀現實的心態，正如陸機詩作《赴洛》首二句所說：“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他們既不能忘懷故國，卻又要出任新朝。守道隱居，固無烈心；隨世浮沉，也沒有高符妙策。這種兩難，正是由於心中不接受現實而造成的。

## (二) 對先祖功業的贊頌

陸氏家族世為吳國重臣，與吳國同氣連枝，休戚相關，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sup>[37]</sup>。陸機、陸雲對其先祖遜、抗極表尊崇，在詩文中對父祖輩屢作稱美，把二祖的功業與孫吳的盛衰連在一起，如兄弟日常贈答之作《贈弟士龍》其一即云：“於穆予宗，稟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惟帝念功，載繁其錫。其錫惟何，玄冕袞衣。金石假樂，旄鉞授威。匪威是信，稱平遠德。奕世台衡，扶帝紫極。”<sup>[38]</sup>陸遜為相，吳國力達到頂峰，而陸抗則能挽救孫皓將亡之朝於既倒，兩人均有大功於吳。兄弟二人稱述二祖功績，同時也肯定了與陸氏家族關係密切的孫吳王朝的正統地位。

陸機頌贊父祖輩的作品有《祖德賦》及《述先賦》，對乃祖功業廣加褒揚，誠如其《文賦》所云：“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祖德賦》選取了祖父遜與蜀漢劉備的西陵之役作為主線。孫權黃武元年（公元222年），劉備為關羽荊州之敗復仇，率軍襲取西陵，陸遜智破劉備，逼使劉備逃入白帝城，最後病亡。陸

機認為此役為孫吳及陸氏家族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基石，令“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文末更歌詠乃祖，認為陸遜庶幾能比蹤於周公姬旦之功勳<sup>[39]</sup>。

陸機對其父抗的頌揚則見於《述先賦》。陸抗繼承陸遜的遺志，歷仕權、亮、休、皓四朝，是孫吳末造的重臣。他攻克叛將步闡於西陵，與晉軍羊祜對峙，廣行仁政，主張改革，延續了孫吳的國祚，可惜孫皓殘暴怠惰，斷送江山。陸抗死後，未幾晉軍即吞滅吳國。故此，陸機以“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sup>[40]</sup>來描述其父身繫吳國存亡的重要作用，至為中肯。

陸雲對父祖的頌揚，可舉《祖考頌》為例，序文清楚顯示了他對遜（邵侯）、抗（武侯）的功業深感自豪。其序云：“烈祖丞相邵侯、顯考大司馬武侯明德叡哲，沉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繼迹前期，惠成顧者也。是以有吳雲興，而邵侯龍見。遂風騰海隅，電斷荆楚，運籌制勝，底定經略，文德光宣，武功四克，乃作台衡，以御於王政。天綱與先代比隆，義問與前修接響，固所謂汪洋浩浩，不世出者哉！”<sup>[41]</sup>陸雲指出遜、抗為吳國貢獻良多，令吳國壯大；他以“王政”、“天綱”指代孫吳的統治，又可反映他視吳國為受天命之正統的看法。

### （三）對孫吳政權的評價

陸機在吳國滅亡後，於退隱舊里期間寫下《辯亡論》。《辯亡論》不僅“懷宗國之憂”<sup>[42]</sup>，且能集中反映他的正統思想，其中對吳國的君主孫堅、孫策及孫權多方頌贊，強調他們的正統地位。陸機在《辯亡論·上》對武烈皇帝孫堅有以下的描寫：

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遍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

州，颯起之師跨邑，哮闐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sup>[43]</sup>

在孫堅之世，積弱已久的漢室形勢更加危難，奸臣如董卓等竊奪權柄，遂使皇綱解紐。孫堅時為長沙太守，起兵回應，與董卓抗衡，入洛掃清漢室宗祠，祭祀漢室，維護漢室於不墜。陸機在這裏視孫堅為“掃清宗祊，蒸裡皇祖”的重臣，興滅繼絕，扶持漢室正統。

孫堅死後，孫策繼位，仍以興復漢室為念：

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千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sup>[44]</sup>

陸機在敘述孫策的功勳時，強調孫策紹述父業，奠定江東的根據地，文修武備，賓禮名賢，招攬才士，志在廓清天步，扶持漢室正統的政權，協助漢室的皇輿帝座，除亂反正。

孫策英年早逝，大業未就，孫權繼位，繼軌發揚。陸機稱其“講八代之禮，搜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君。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颯而奮……而帝業固矣。”<sup>[45]</sup>正是視吳國為正統的表現。陸機仕吳時曾寫有《吳大帝誄》<sup>[46]</sup>，追述吳國最重要的君主孫權生前的功業、德行，認為孫權登立為帝是順天應人的結果<sup>[47]</sup>。

#### (四) 對吳地文化傳統的堅守

江左的文化水準極高，自古以來便有不少偉人出現，優良的傳統文化植根已久。因此，陸機對北方士人不會採取卑躬屈膝的態度，始終保持孫吳望族的自信，遇有來自北方士人的挑釁、質疑，往往反唇相譏，絕不示弱。陸機身為南方士人之首，他對

北方士人的態度，正好顯示他不接受南卑北尊的看法，這方面的記載，在《晉書》與《世說新語》中都能找到。《晉書·張華傳》有以下一則記載：

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sup>[48]</sup>

陸機兄弟以出自孫吳著姓而自視甚高，即使身仕貳朝，也不把中原人士放在眼內，只與能賞識他們的張華友好。陸機入洛後曾聽說左思欲作《三都賦》，適逢陸機也欲為此賦，因而“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sup>[49]</sup>。他對北方士人的態度可見一斑。

吳人亡國後入洛，中原人士常借機對南來士人奚落一番，即使知名如華譚、袁甫，也難免受北士嘲諷。陸機入洛，也曾受冷嘲熱諷，如王濟曾指北方的羊酪，語帶挑釁地問陸機：“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機當然不甘退讓，從容應對：“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因而受到時人稱許。

陸機入洛投誠，受北人歧視，卻毫不退讓，扞衛吳士的聲譽，這全因他肯定自己的身份，對身為吳人表示一種堅持。在陸機的作品中，也有流露這種感情思想的篇章，可惜機作散佚者多，只剩一鱗半爪的資料，但仍可與陸機的事跡聯繫起來，從中窺見詩人的心態。陸機初入洛時受中原士人輕視，於是以《吳趨行》引以自況<sup>[50]</sup>：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樂承遊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

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侷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摧爲此歌。<sup>[51]</sup>

《吳趨行》李善注云：“吳人以歌其地也”。陸機承襲舊題，歷叙吳地城市的繁盛、物產的豐富、土風的高尚（秦伯、仲雍兩兄弟均有仁讓之風；季札守義不爭，且又出使華夏各國，觀樂而知盛衰，光耀諸華），後來又言及漢末混亂，孫吳崛起，文德武功大盛，江左四姓人物輩出，絕不讓中原八族專美，處處指出吳國是一個在各方面都能與中原匹敵的強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詩中多處強調吳國“土風”之“清嘉”，“仁風”之延續，“禮讓”之風的“流化”，可見他對於吳國風俗教化之美的自豪感。由此反觀二陸對北方“異俗”的不適應，也能看出在他們心目中，吳國纔是真正能够傳承王風教化的禮儀大邦。

陸機於惠帝永康元年（四十歲）時寫的《羽扇賦》，便假設宋玉折服山西河右諸侯的故事，來表達南勝於北的意見<sup>[52]</sup>。賦以楚王、宋玉、唐朝代表南方的人物，與北方的山西與河右諸侯對比，又以代表北方的五明扇、安衆扇、麈尾與南方慣用的羽扇比較<sup>[53]</sup>，最後更折服北方的諸侯，各執烏羽歸去。陸機借宋玉、羽扇這些南方的人、物，來指代孫吳，用意是十分明顯的。宋玉在外交上能以精彩的文辭制勝，說明陸機認爲以南北比較，南方的人物、文化更優於北方。

陸雲在作品中對吳國文化的認同、取材與兄長陸機一樣，都是從歷史角度切入，歷叙自古以來吳地人物的昌盛。他寫給叔父的《與陸典書書》，曾經提及這方面的看法：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邈世立德。龍蜿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唏。高蹤越於先民，盛德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響馳聲，沉淪漂流，優遊上國。聽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荷。言偃昭烈

於孔堂，員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繼踵，亦為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sup>[54]</sup>

陸雲開篇即明言吳地乃“國士之邦，實鍾俊哲”，以下敘述泰伯遁世讓賢，季札觀樂的歷史，與上引陸機《吳趨行》同出一轍。繼而分述文武，以孔門四科文學之首的吳國人子游及輔佐吳國稱霸的伍員及孫武，證明吳地人才輩出，呼應起首“國士之邦”。陸雲巧妙地把孫吳與自西周春秋以來的吳國連成一綫，讓人自然想到吳地厚重的歷史文化，強調父母之邦的先進文明。信中同樣強調了吳太伯禮讓的“清風”、“盛德”在吳國的深遠影響，指出雖然國運衰落，但人才德化絕不下於華夏。

二陸對身為南方士人的自尊自信，不獨是一種個人心理上的感受而已，事實上，吳會一帶，在孫吳治下的 58 年間，文化的發展是極有成就的。僅就作家作品的流播來看，筆者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吳國著作的數量作一統計：三國時吳地經史子集著作極多，數量雖次於曹魏，但遠過於蜀國<sup>[55]</sup>，更大大超過春秋戰國時的吳、越、楚等地的總和。因而可以說孫吳文化的繁榮是戰國以來南方文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值得注意。孫吳士人更以紹承泰伯遺風自居，因此他們對吳人的身份頗為自負，故於入洛初期，未能接受現實而與北方士人的關係較為緊張。

吳作為六朝的第一朝，雖然沒有在政治上取得漢、魏、晉的正統地位，但從以陸機為代表的南方士人對於西晉的態度，已經可以看出：伴隨著南北政治的分裂而產生的士人對文化取向的分歧由此開端。孫吳繼承東漢醇儒之學術，土風清嘉，民俗敦厚，人才鼎盛，物產豐饒，並有扶持漢室正統的政治傾向，在這些方面吳國士人找到了南方文化更優於北方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這種想法出現在吳國初亡的入洛南士心中，實屬人之常情。在統一的西晉王朝，隨著南北士人的交流增多，南北文化的碰撞由

激烈而趨於緩和，南北交流藉著南北士人遷徙而漸次建立，推動著文化的融和。但是在以後長期分裂的南北政局中，政權的正朔之爭始終存在。正如後來北齊開國之主高歡所說：“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sup>[56]</sup>正朔所在取決於王風、禮儀、教化的傳承，而不取決於地處南北。這一觀念是以二陸爲代表的吳國士人最早通過文章和詩賦作了明確表述的。這也正是二陸的文化觀念在魏晉南北朝的南北交流史中的意義所在。

### 三、二陸對北方學術文化的吸取

南士入洛，如顧榮、紀瞻、賀循、薛兼等，北人均視爲“南金東箭”，極看重他們的才華，尤其二陸，張華更譽爲“伐吳之役，利獲二俊”<sup>[57]</sup>。東吳的文士，在統一前已聞名北地，故西晉統一南北，亟欲羅致南方人才。《世說新語·文學》載：“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sup>[58]</sup>二陸入洛既得時譽稱許，陸機“文章已自行天下”<sup>[59]</sup>，對文學界應起到一定的影響。陸機的作品更受北方士人的推崇，陸雲給陸機寫信時提到：“一日見正叔（潘尼之字，潘岳之侄兒，時號稱二潘），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sup>[60]</sup>陸雲把其兄之《讀古五言詩》<sup>[61]</sup>示之於潘尼，潘尼贊歎不已，非常佩服。

陸機入北，在北方文壇廣受認同，但文化的南北交流向來不是單方面的。陸機入洛後，對北方學術的接受，主要可從玄學方面觀察<sup>[62]</sup>。上文曾提及東吳繼承漢儒傳統，學風醇厚，與北方好尚玄學清談的學風大相徑庭，陸機“伏膺儒術，非禮不動”<sup>[63]</sup>，承傳江南的傳統學風。然而，二陸的作品也滲透了玄學的思想。二陸學習玄學清談，可以一則異聞加以說明。《晉書》載陸雲曾遇到王弼的鬼魂而玄學突飛猛進：

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塚。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sup>[64]</sup>

這則異聞又記載於不同古籍中，情節繁簡有別，內容大同小異，主要是主角為陸機與陸雲的分別，及跟王弼的鬼魂談話的內容有異，一是《老子》，一是《周易》。無論是《老子》，抑或《周易》，均是玄學據以立說的典籍，說明二陸玄學殊進而已；至於主角究竟是陸機或是陸雲，在此同樣可不必深究，因兩人背景、經歷基本相同，這正可說明二人入洛後都有接觸玄學，而且有所進步<sup>[65]</sup>。可稍作補充的，是《晉書》以陸雲作這則異聞的主角，大抵由於他“有才理”，“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sup>[66]</sup>，與其談辯較為出色有關。

唐長孺先生認為“二陸雖染習玄風，而現在傳世二陸著作均與玄談無關”<sup>[67]</sup>，但細閱二陸詩文，仍能找到一些作品體現了玄學對二陸文學創作的深微影響。陸機的賦作如《文賦》、《豪士賦》，詩作如《招隱詩》，陸雲的《逸民賦》、《逸民箴》等，都有玄學思想的反映。

在分析《文賦》的玄學思想時，先要辨清此賦寫於陸機入洛前抑或入洛後。關於這個問題，歷來有不同看法。杜甫《醉歌行》云：“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成為陸機二十歲作《文賦》的較早說法，影響頗為深遠。其後清人何焯雖不同意陸機年二十即能作《文賦》，引臧榮緒《晉書》，認為陸機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積學十一年，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入洛，但仍論斷此賦“殆入洛之前所作，老杜云‘二十作《文賦》’，於臧書稍疏也”<sup>[68]</sup>。何焯所云即指陸機年二十正值國難，其後退隱讀書，積學十一年，方成此賦，故定《文賦》作於入洛之前，

不贊成陸機於二十歲時已能對創作過程曲折論盡，寫下《文賦》，成一大手筆。按《文賦》的論理精微，引譬精闢，何氏所言也有其道理。《文賦》的寫成年代向來有不同推測，衆說紛紜。其實，在二陸來往的書信中，可找到《文賦》的寫成年代的重要資料。陸雲《與兄平原書》(其八)中，一口氣提到了《述思賦》、《文賦》、《詠德頌》、《扇賦》、《感逝賦》及《漏賦》6篇賦作，其中能找到6篇作品寫於同一時期的證據。陸雲於信末對陸機於短時間內能寫成多篇構思新奇的作品稱贊不已，說：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sup>[69]</sup>

“兄頓作爾多文”一句，可以推測陸機諸賦創作時間不應相差太遠。逯欽立早已指出這通書信可定《文賦》的寫作年代：“凡此諸文，若有一可徵年代者，則《文賦》之疑年，即可斷定。”<sup>[70]</sup>逯氏又認爲二陸書札中提及的《詠德頌》已佚，而《述思賦》、《羽扇賦》及《漏賦》年代無可稽考，並斷定《感逝賦》即陸機之《歎逝賦》，序中明言“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故據此定《文賦》作年同於《歎逝賦》<sup>[71]</sup>。逯欽立以二陸書札的直接史料作內證，考出《文賦》的寫作年代，實爲精審之論。逯氏所云年代皆無可稽的諸篇陸機作品，不少學者已加以考訂。如姜亮夫以《羽扇賦》內容推測陸機以楚王、宋玉與山西河右諸侯作對比，引以自況，表現南北關係的矛盾，故斷其作於公元300年入

洛之後<sup>[72]</sup>；而劉暉好認爲二陸與張華交情甚深，張華於晉惠帝年間趙王倫奪權時被殺，陸機爲其作《詠德頌》以悼亡<sup>[73]</sup>。餘下兩篇陸機作品，《漏刻賦》成年確難以稽考；至於《述思賦》，雖無序文或其他繫年綫索，但仍能於陸雲與陸機討論文章的書札中找到佐證：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sup>[74]</sup>

陸雲認爲自己的《歲暮賦》難與兄長的《述思賦》相匹。按《歲暮賦》序云：“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sup>[75]</sup>據此，《歲暮賦》即作於晉惠帝永寧二年(302)，則陸機《述思賦》，也當相去不遠。歸納以上考證，《文賦》既與其他諸篇同時而作，則“凡此諸文，若有一可徵年代者，則《文賦》之疑年，即可斷定”。故可推定《文賦》作於陸機入洛之後，公元300年前後。

魏晉玄學的一個重要課題是言意之辨。言意之辨的提出，可上溯自《易·繫辭上》：“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魏晉崇尚清談，對言意之辨這類哲學命題尤感興趣，荀粲、王弼早發之於前<sup>[76]</sup>，其後孫盛、殷浩、劉惔更展開激烈辯論<sup>[77]</sup>，孫盛論《易》象“妙於見形”，主張言能盡意，而其他名士則不贊同此說，認爲言不盡意。可見兩晉之世，士人熱衷於探討言意之辨的玄學課題。言意之辨在思想界是重要論題，文學創作涉及作者的思想意理與言語文字表達的關係，更具有直接影響。《世說新語》有一則關於文學創作中言意關係的探討：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sup>[78]</sup>

庾敬與侄兒文康對賦作“有意無意”的討論，正好反映在言意之辨的哲學思潮之下，文士十分關注言語文字能否充分傳情達意的問題。

陸機於《文賦》的序文中交代作賦之由，也透露了對言意之辨的思考：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sup>[79]</sup>

序言清楚說明自己寫作《文賦》的目的，是希望體會為文者之用心，文章遣詞用語的美惡好壞，可析而言之，最困難的地方，莫過於對為文之用心的探討。這關鍵之處最難掌握。“意不稱物”即謂作者之意與摹寫之物不相符合，“文不逮意”即文辭不能表達作者之意，這裏表達了作者要表現物情，非用文字不可，但又往往文不逮意，這便是創作上“言”、“意”關係的問題了。

《文賦》首段先道出玄覽萬物與頤志典墳是為文之所由。通過玄覽萬物，作者生起或悲或喜之情，但文思之始，須“收視反聽”，靜思冥求，心神騫游於八極萬仞之外，情意由朦朧而漸至鮮明，鮮明的物象湧現不絕，意與象漸趨融合。作者要把這種情意宣之於文，便要探討言與意的關係：“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佛悅，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群言”、“六藝”兩句即指“典墳”，“天淵”、“下泉”兩句可譬“玄覽”，兩者相合，再通過文詞表達。這過程或吐辭艱難，若游魚吞鈎，徐緩方成；或華藻不斷，如飛鳥中箭，迅疾而得。表現把心中意化為筆下文的歷程，涉及了言意關係的探討。

陸機在《文賦》中，雖沒有明確表達對言意之辨的看法，但

卻於字裏行間流露了文不逮意之感，如序文中云：“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他在賦文中進一步加以描述：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sup>[80]</sup>

文章之體制無論豐約，都應該因其所安，適其所變。文學創作的微妙之處，猶如輪扁運斤，只可心悟其妙而難以言傳，即序文所言“難以辭逮”之意。於此可見，陸機的觀點與當時玄學之士所主張的言不盡意，有其相通之處。所以北方玄學中的思想也啓發了陸機對文學創作原理的思考，促成了《文賦》的寫作。

除《文賦》之外，陸機其他作品中也時而流露道家思想的痕迹。如其《豪士賦》，李善注云：“機惡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sup>[81]</sup>賦作旨在譏刺齊王司馬罔自恃誅趙王倫功大，跋扈自恣，不僅不思功成身退，更有覬覦天下之心，最後敗亡。在序文中，寫道：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sup>[82]</sup>

魏晉玄學重視《老》、《莊》、《周易》，並稱三玄。陸機此處表述對功名的態度，即深受《老子》的影響。首先，他視人君的權柄

爲神器，不可侵犯，這裏的“神器”，與《老子》所說的“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同理，假如有人生起覬覦之心，即犯了《老子》所言“夫代大匠斲，稀有不傷其手”的錯誤，竊弄權柄的下場與齊王罔無異。然而，賢愚物我，無分彼此，共有相同的弱點，同有自我之欲，自視過高<sup>[83]</sup>。這裏流露了萬物齊一的觀念，要避免“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唯有時刻記取道家對功名的戒懼：“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豪士賦》）後來成都王司馬穎任用陸機爲河北大都督，督軍二十萬，以征討長沙王乂，陸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爲由，欲辭都督之職，但司馬穎不許，最後軍敗受誅。可見陸機雖伏膺儒術，但對待功名的態度，仍深受道家影響。陸機對功名基本上是孜孜追求的，他只是抱持老子對功名如履薄冰的心態，並於求富貴不得時，轉向道家尋找慰藉，如《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sup>[84]</sup>“至樂”與“淳樸”均見《莊子》，流露出對隱逸生活的嚮往，雖爲詩人的牢騷語，並非真心歸隱<sup>[85]</sup>，但仍透露了陸機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的痕迹。

陸雲入洛之後，曾致力學習玄學，故“談老殊進”，曾自稱“通好莊聃，儀形有作”<sup>[86]</sup>。其作品中也能找到玄學的痕迹，如《逸民賦》所言“載營抱魄，懷元執一”，“物有自遺，道無不可；萬殊有同，齊物無寡”<sup>[87]</sup>，《逸民箴》所言“乃雕乃藻，大樸既散”<sup>[88]</sup>等語，均反映了陸雲的玄學思想。《逸民賦》的寫作原因，陸雲在《與兄平原書》（其三）中已清楚交代：“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作，願必留思。”<sup>[89]</sup>而《逸民箴·序》則云：“余昔爲《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之美，寵祿之華靡，偉名位之大寶，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寶，位者物之寄。窮高有必顛之吝，

溢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故爲《逸民箴》，以戒反正焉。”<sup>[90]</sup>據此可知，《逸民賦》出，即引起了西晉文壇的不同意見，是具有影響力的作品。

皇甫謐於《高士傳·序》中說：“謐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sup>[91]</sup>當中收錄了不少道家的人物，如老子李耳、庚桑楚、老萊子、莊周、黔婁先生、河上丈人、樂臣公、蓋公、安丘望之、向長、高恢等。由於道家思想主張出世，不主張入仕，故皇甫謐《高士傳》記載了較多道家人物。陸雲《逸民賦》受皇甫謐《高士傳》啓發，也宣揚“輕天下，細萬物”，“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的出世思想。

綜觀之，二陸入洛，內心雖有矛盾、掙扎，而且常受到北方士人的奚落，但在陸氏家族重視功名的傳統家風影響下，二人始終以入仕爲人生選擇。他們憑著個人的才學，得到北方文壇的重視，在北方有一定影響；而二陸入洛後，也接觸到與東吳不同的學風，玄學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某些作品的內涵。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其文學成就正是南北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產物。這也是將二陸入洛置於魏晉南北朝的南北交流史中考察的意義所在。

（作者：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中心語文導師）

#### 注釋：

[1]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五二《華譚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冊，第1452頁。

[2] 同上書，第1450頁。

- [ 3 ] 同上書,卷六八《賀循傳》,第6冊,第1825頁。
- [ 4 ] 周一良著《西晉王朝對待吳人》,《魏晉南北朝史劄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72頁。
- [ 5 ] 陳壽撰《三國志》卷二二《魏書·陳群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冊,第636頁。
- [ 6 ] 同上書,卷四二《蜀書·譙周傳》,第3冊,第1030頁。
- [ 7 ] 同上書,卷五二《吳書·步騭傳》,第4冊,第1238頁。
- [ 8 ] 《晉書》卷二三《樂志下》,第3冊,第701—702頁。
- [ 9 ] 曹道衡先生認為《晉書》中有關晉人與吳士的針鋒相對,“無非是一些意氣用事”之爭。詳見《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
- [ 10 ] 湯用彤《魏晉玄學流別略論》,載《魏晉玄學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頁。
- [ 11 ] 同上書,《王弼大衍義略釋》,第56頁。
- [ 12 ] 同上書,《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第77頁。
- [ 13 ] 同上書,《魏晉思想的發展》,第111—112頁。
- [ 14 ] 《三國志·吳書·嚴峻傳》:“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謹、步騭齊名友善。”
- [ 15 ] 《三國志·吳書·程秉傳》:“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土變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 [ 16 ] 曹道衡:“吳越一帶的儒學從東漢時代起,已培育出了不少儒生。……到了三國時代,吳地的經學著作更多。”(見曹道衡《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第101、103頁。)
- [ 17 ] 《晉書》卷四七《傅玄傳》,第5冊,第1317—1318頁。
- [ 18 ] 姜亮夫著《陸士衡年譜》,世界書局1973年版,第16頁。
- [ 19 ] 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頁。
- [ 20 ] 曹道衡:“我國的統一雖於秦漢時代已基本完成,但各地區之間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還是不平衡的,各地生活習慣更不能完全一樣。因此,地區的差別並不會因統一而消失。”(見《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第35頁。)

- [21] 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卷十《辯亡論下》，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1頁。
- [22] 《文賦注》引臧榮緒《晉書》：“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十七，第761頁。）
- [23] 《赴洛二首》繫年據顧農之說。參顧農《陸機還鄉及其相關作品》，《文學遺產》2011年第5期，第18頁。
- [24] 蕭統編、李善、呂向等注《六臣注文選》，卷廿六，《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0冊，第609頁。
- [25] 佐藤利行著、周延良譯《西晉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頁。
- [26] 曹道衡推測云：“新朝君主，懼亡國之臣伺機變亂，自植根之土徙而之它，歷朝多見。平蜀後即徙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入中畿，事見《蜀志·諸葛亮傳》、《晉書·文立傳》、《華陽國志·大同志》。吳平，陸氏全家自在彼徙之列，《晉書·陸機傳》、《陸雲傳》諱不載耳。”曹道衡、沈玉成《陸機、陸雲兄弟贈答詩十首》，《中古文學史料叢考》，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32頁。
- [27] 由於陸機重視功名，即便置身危險的境地也不肯抽身離去，最後落得悲慘的下場。《晉書·陸機傳》：“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 [28] 《陸機集》卷五《又赴洛道中二首》其一，第40—41頁。
- [29] 同上書，卷二《懷土賦》，第16頁。
- [30] 章炳麟《陸機贊》：“辭賦多悲懿親彫喪，懷土不衰，張華以為聲有楚焉。”轉引自姜亮夫《陸士衡年譜》，第1頁。
- [31] 姜亮夫：“思鄉也。入洛不久之作。”《陸士衡年譜》，第97頁。
- [32] 呂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六臣注文選》，卷廿四，第1330冊，第561頁。
- [33] 張銑云：“堂構，祖考所構之堂，皆崩頽毀瘁，城闕亦丘墟荒蕪，此機情多，傷吳亡矣。”《六臣注文選》，卷十六，第359頁。
- [34] 黃葵點校《陸雲集》卷一《愁霖賦》，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0頁。
- [35] 同上書，卷四《答張士然》，第91—92頁。
- [36] 呂延濟注此詩云：“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六臣注文選》，卷廿五，第574頁。

- [37] 《晉書》卷七七《何充傳》，第7冊，第2030頁。
- [38] 《陸機集》補遺卷二《贈弟士龍詩十首》其一，第155頁。
- [39] 同上書，補遺卷一《祖德賦》，第148頁。
- [40] 同上書，補遺卷一《述先賦》，第149頁。
- [41] 《陸雲集》卷六《祖考頌》，第115頁。
- [42] 張溥著、殷孟倫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陸平原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頁。
- [43] 《陸機集》卷十《辯亡論上》，第125—126頁。
- [44] 同上書，卷十《辯亡論上》，第126頁。
- [45] 同上書，卷十《辯亡論上》，第127頁。
- [46] 姜亮夫認為《吳大帝誄》是陸機入洛以前的作品：“按文中敘述權姿質俊朗，登立為帝，及死後榮哀，有哀痛愛慕之感，而無憂傷恐懼之情，而行文力求茂密，遣辭務為安雅，非亂離以後情懷可比，與《辯亡》相較，且當在前。余疑其為吳未亡前之作。”見《陸士衡年譜》，第43頁。
- [47] 誄辭前半部如下：“我皇明明，固天實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詳鬼神……有覺德徽，兆民欣順。”
- [48] 《晉書》卷三六《張華傳》，第4冊，第1077頁。
- [49] 同上書，卷九二《左思傳》，第8冊，第2377頁。
- [50] 姜亮夫：“初入洛時見輕中原，乃為此以自況也。”見《陸士衡年譜》，第97頁。
- [51] 《陸機集》卷六《吳趨行》，第72頁。
- [52] 同上書，卷四《羽扇賦》，第33—34頁。
- [53] 姜亮夫：“《羽扇賦》蓋以自況，故假楚王、宋玉與山西河右諸侯作對，塵尾與羽扇作對。”見《陸士衡年譜》，第80頁。
- [54] 《陸雲集》卷十《與陸典書書》，第170頁。
- [55] 筆者據《隋書·經籍志》，統計三國時魏、蜀、吳的作者及著作數量：曹魏作者100人，著作165部；蜀漢作者5人，著作5部；孫吳作者45人，著作92部。
- [56] 司馬光著《資治通鑑》卷一五七《梁紀》十三，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4881頁。
- [57] 《晉書》卷六八《薛兼傳》，第6冊，第1833頁及卷五四《陸機傳》，第5冊，第1472頁。

- [58] 劉孝標注引《文章傳》。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文學第四，第 84 則，第 261 頁。
- [59] 《陸雲集》卷八《與兄平原書》，第 135 頁。
- [60] 同上注。
- [61] 《讀古五言詩》已佚。據佐藤利行《陸雲研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7 頁。
- [62] 蔡彥峰：“陸機入洛後，受到玄學的影響非常顯著，《文賦》就是以玄學為思想基礎的，這是文學史上一個普遍的認識。”見氏著《玄學“言意之辨”與陸機〈文賦〉的理論建構》，《文藝理論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127 頁。
- [63] 《晉書》卷五四《陸機傳》，第 5 冊，第 1467 頁。
- [64] 同上書，第 1485—1486 頁。
- [65] 唐長孺：“……這個故事的產生卻有其背景。二陸在入洛之前，在江南的學術環境中對於中原玄學必未深入研究，入洛之後，為了適應京洛談玄之風可能加以學習，有人奇怪他們‘本無玄學’，而居然也能對答一下，纔生出這樣一個故事來。”見《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 355 頁。
- [66] 《晉書》卷五四《陸雲傳》，第 5 冊，第 1481 頁。
- [67] 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 355 頁。
- [68] 何焯著《義門讀書記》卷四五，《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60 冊，第 660 頁。
- [69] 黃葵點校《陸雲集》卷八《與兄平原書》，第 137 頁。
- [70] 逯欽立《〈文賦〉撰出年代考——〈文賦〉箋證之一》，《學原》1948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61 頁。
- [71] 同上注。
- [72] 姜亮夫《陸士衡年譜》，第 80 頁。
- [73] 劉運好《陸士龍文集校注》卷八《與兄平原書》，第 1114 頁。又，《晉書》云：“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晉書》卷三六《張華傳》，第 4 冊，第 1077 頁。）
- [74] 黃葵點校《陸雲集》卷八《與兄平原書》（第十八），第 141 頁。

- [75] 同上書,卷一《歲暮賦》,第6頁。
- [76] 湯用彤云:“王輔嗣以老莊解《易》,於是乃援用《莊子·外物篇》筌蹄之言,作《易略例·明象章》,而為之進一新解。文略曰:‘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然‘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因此言為象之代表,象為意之代表,二者均為得意之工具。吾人解《易》要當不滯於名言,忘言忘象,體會其所蘊之義,則聖人之意乃昭然可見。王弼依此方法,乃將漢易象數之學一舉而廓清之,漢代經學轉為魏晉玄學,其基礎由此而奠定矣。”見《言意之辨》,載《魏晉玄學論稿》,第24頁。
- [77] 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第四,第56則,第238頁。
- [78] 同上書,文學第四,第75則,第256頁。
- [79] 《陸機集》卷一《文賦》,第1頁。
- [80] 同上書,第4頁。
- [81] 《文選》卷四六《豪士賦·序》,第2043頁。
- [82] 《陸機集》卷八《豪士賦》,第9頁。
- [83]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李善注引《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文選》卷四六,第2044頁。)呂延濟注云:“自我,謂自說己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以為敗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六臣注文選》卷四六,《四庫全書》,第1331冊,第225頁。)
- [84] 《陸機集》卷五《招隱詩》,第43頁。
- [85] 顧農《說陸機〈招隱詩〉》,《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3期,第139頁。
- [86] 《陸雲集》卷二《四言失題》其八,第27頁。
- [87] 同上書,卷一《逸民賦》,第1頁。
- [88] 同上書,卷一《逸民箴》,第5頁。
- [89] 同上書,卷八《與兄平原書》(其三),第135頁。
- [90] 同上書,卷一《逸民箴》,第5頁。
- [91] 皇甫謐《高士傳》,《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冊,第86頁。

# The Migration of Lu Ji and Lu Yun and its Influence in Cultural Exchanges

**Kan Hon Kin**

(Language Instructor, The Centre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bstract:**

Lu Ji and Lu Yun were important writers of Western Jin; they were very famous in the south and migrated to the north finally. Lu's famil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ynasty of Wu. After the fall of Wu, Lu Ji and Lu Yun migrated to Luo Yang, fac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The feeling of loneliness and maladaptation were reflected through their literary works, however, the coherence could be obtained after collision. As Lu Ji and Lu Yun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ties in Wu, their lives and literary works could be regarded as typical in the group of migra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early Six Dynasties.

**Keywords:** Lu Ji, Lu Yun, the Southerners migrated to the North, the mentalities of literaties,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